

人文
学术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理论的时空

钱中文 著

Selected Essays 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y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执行主编 李 钧

钱中文 著

理论的时空

Selected Essays 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y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的时空/钱中文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6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1395-2

I. 理… II. 钱… III. 文艺理论-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0605号

理论的时空

钱中文 著

责任编辑/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5 字数 233 千

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1395-2/I·908

定价:4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受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着手组织“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想起了十多年前由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那套大型丛书先后出版了三十余位当代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自选的论文集,可以说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和检阅。“丛书”从2000年第一辑(六本)出版起,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又有了巨大的进展,文艺理论的建设也继续经历了激荡起伏的进程。现在再编辑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可能历史和现实的语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考虑到出版周期的原因,“文库”计划先期出版十二本。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有成就、有影响的知名学者远超这个数字,所以我们只能优先考虑“三〇后”“四〇后”学者加盟这套“文库”,但即便如此,目前只能有十二位学者入选,还是难免挂一漏万,这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也期待在以后的时间里再能陆续出版。

入选“文库”的这十二位学者,基本上都是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理论文集,记录着每一位作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感受到的深切体验,所获得的宝贵感悟,所留下的坚实脚印,以及靠着艰辛耕耘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虽然无法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成果,但至少也可以折射出它的部分光影,勾勒出它的大致轨迹,对今后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或有些许参照价值,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缘由。

如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作一个大致分期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令后来者怀想的年代。启蒙的激浪,保守的潮汐,新生的欢欣,怀旧的惆怅,都错综复杂地交织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心灵。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文学正名”“回归文学自身”的呼吁,冲破了长期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充当政治工具的禁锢,重新发现和

肯定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学界学习马克思《巴黎手稿》引发的人道主义、人性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得以确立；声势浩大的“方法论热”和稍后的“文学主体性”问题全国大讨论，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文学本质的重新思考先后形成了“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初步框架，为学科在90年代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而贯穿上述种种理论探讨、展示时代气象的主线，则是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充满了争议的碰撞和交融。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集中体现为观念方法的更新和思维空间的拓展。虽然当时及以后批评嘲讽之声不绝，但作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和一代学人的亲身经历，它实际上塑造了文艺理论家们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较之于他们的具体理论成果更为重要的。

经过新时期前十年的理论积淀后，90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了一种多元发展的新阶段。随着西方现当代文论思想被积极引介到中国，一种迫切想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的现代性冲动也成为国内文艺理论家们挥之不去的情结。9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同时以哲学和文论的名义登陆国内理论界，就是一个富于意味的信号。由此带来的研究格局也显得流派纷呈，思潮更迭，这是转型期中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的必然表征。90年代最值得关注的是1994年前后国内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主阵地尽管不在文学理论领域，但最初发动是在文学界。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大潮勃兴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形成巨大冲击，造成文学创作中“人文精神失落”的现实危机，引发了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的广泛反思，由此才催生出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人文使命等一系列话题。经过这场大讨论，文艺理论界的研究探索在多个向度上向纵深发展：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有了新的进展，“审美意识形态论”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成为文学理论建构中深层次的思考；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译介、研究以及批判性的吸纳始终在争议中前行；与此相关，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今；90年代末，文艺理论界站在世纪之交的制高点上，对整个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五十年文艺学的流变历史和经验得失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历史的反思，寻找继续前进的正确路径……整个90年代，中国文艺学在新的经济社会语境中闯出了多元发展的可喜局面，如心理学、生态学、接受理论、诸种现代语言学、人类学、比较文化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解构

主义、哲学解释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学说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批评方法不断涌入,并与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既相冲突又相融合,进而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论的多元化展开,有些研究方法还推动了文艺学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的建立,如文艺心理学、生态文艺学、文学修辞学、文学人类学、文学解释学、文学叙事学等,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学理论话语和学科形态的建设,使之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时代终于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在加快,现代性焦虑在趋深,中国文学理论又迎来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发展阶段。文化研究蓬勃兴起,冲击着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格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视像文化的异军突起,“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主张的提出,在短短几年里迅速转移着学界的注意力,成为新一轮文艺学关注和争鸣的兴奋点;与此相关,在后现代主义文论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下,围绕文学本质问题,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掀起新的波澜;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尤其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成为越来越多的文艺理论家的自觉追求;对西方文论借鉴的态度比过去更加冷静和辩证,盲目崇拜、亦步亦趋的现象明显减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 90 年代偏重于理论的探讨转向了务实的尝试和实践,在古代文论与基础理论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做出了可喜的实绩;文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建构和文艺学教材的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着文艺理论界多数学者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网络文学的迅猛崛起,打破了原有的文学作品生成和传播的格局,向传统文学理论发起了挑战,成为当代文艺学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比起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的文艺学发展显得更加沉稳,更加深入,更加扎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突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自觉努力贯穿于这三个时期的始终。我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标准,从美学的和史学的,到人民的、美学的、历史的和艺术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进展和最高成就。由此可见,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健康的。那种把当代文艺理论要么看得危机重重、漆黑一团,要么说成完全是始终跟在西方文论后面亦步亦趋、搞全盘西化那一套的观点,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所编辑的这套“文库”中的十二本论文集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还远远不够

充分。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在其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的总序中曾经预言,“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收入丛书的众多论文集,“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21世纪的前十五年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编辑的“文库”,同样希望能够作为当代文艺学的一部分思想资料,“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参照、启示和借鉴。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能够在我国人文学术著作出版困难重重的今天推出,实在是极为难得的。这里,我们必须专门介绍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孙晶博士。是她首先主动向我们提出建议,出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她的远见、魄力和眼光令人敬佩。在此,我们代表“文库”的十二位作者,向孙晶总编及复旦大学出版社有关编辑们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们不能不为“文库”的作者之一、我们敬爱的童庆炳先生的猝然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以他今年4月亲自编辑的论文集《文学:精神之鼎与诗意家园》的出版作为我们对他的纪念,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朱立元 曾繁仁

2015年国庆节

自序

收选在这个集子里的论文，都写于新世纪。新世纪的十多年间，文学理论较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转入了新的理论时空。

一进入新世纪，迎面而来的是一大批新问题。由于当今进入了信息时代，网络文化时代，高科技层出不穷的时代，文学创作确实在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转向图像化、网络化、娱乐化的潮流相当突出。文字书写方式、承载的载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于是不少外国学者认为，传统的、书写的文学已经走向了终结，昔日文学自身的内涵已经不复再现，但是文学虽然走向了绝路，所幸它没有“绝后”，它还剩下文学性。最明显不过的是今天日常生活审美化了，文学性已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在社会科学各个方面，而保存了文学的苗裔，或是说凤凰涅槃了。外国的著名哲学家说，文学作品可以当做哲学、政治学著作来读，同样，哲学、政治学等门类的学术著作，可以当文学作品欣赏，而且宣布，由于文学性统制了社会科学，所以文学、文学理论的方法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文学性既然无处不在，日常生活现象审美化了，那些物质现象当然得了“文学性”之灵气，就理应进入原有的文学概念。

这类新论一出，不少中国学者做了积极的响应。文学虽然终结了，但通过社会科学、日常物质现象竟是浴火重生。所以当今文学是什么？现在还没有定论。这样看来，原有的文学理论自然滞后，与现实的需求和教育严重脱节，原有的基础理论完全失效。本来文学理论自身自有其不断修正、更新与创新的问题，它比形式不断翻新的文学创作大大地落后，也比文学批评落后了。出路何在？在于文学理论需要改变对于文学的理解，必须打破原有文学的界限，拓展它的边界，必须就文学进行扩容，把已经审美化了的日常生活现象扩入文学中去，以文学批评或是文化批评来代替文学理论。并且，

今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已经不是去研究文学本身,而是文学性。

我对后现代文化思潮传入中国发生影响的时候,就有所评述,分析不很全面,但我大体理解它的可接受性的一面:它在反中心、反思想绝对化、反思想霸权、反学术思想大一统、反理论僵化等方面,表现了强大的活力与生机,它主张文化的多元化等等,这些方面的思想,大大活跃了我国的思想界,同时在思想解放方面,也使人们获益良多。但我又不同意它的藐视一切、真理全在我手上的势利俗气和新的庸俗化倾向,那种宣扬新的二元对立,消解一切的虚无主义倾向,以及一味利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极方面,对人类历史积累起来的文化价值实行消解,对过去的文化积累不予认账(他们后来的一些著作有所变化),重复那种非此即彼的思想倾向。它把别人贬得一无是处,以图打倒别人的霸权,但却又树立了一种新的自己的理论霸权。

看来要建设现代文学理论新概念,诸多问题需要研究,克服理论上的障碍。

比如,我们的文化、文论建设,我以为都要适合当今的需求,即现代化的需求,并以现代性为指导。我们的社会毕竟处在还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而且还有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今天仍是如此。在我们社会,前现代现象仍然存在,封建制度残余与极端贫困的现象并未彻底清除。面对整个世界,一面是战乱频仍,文化冲突在血肉飞溅中大行其道,大量的贫困与死亡又使未来弥漫着不确定性,生存艰辛;一面是科技的迅猛发展,财富获得大力增长,而物质生活的改善,又不断促进物欲的追求,金钱成了理想与信仰,而感性肉欲的膨胀,醉生梦死的文化演出,常常上演到娱乐至死的地步。后现代性是适应后现代文化的需求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想,它的特征一如它的主张,主要是表白自身,描述自身,而不做规范,它也不准备规范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了文化、文论建设可以吸取后现代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但应是现代化的文化、文论建设,而不是后现代文化、文论的建设,所以还是要以现代性为指导。比如,反对思想霸权、绝对化、大一统、僵化,主张多元,也是现代性的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应有之义,把它们完全归为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并不合乎事实。几位马列文论专家一听要以现代性为主导,立刻冲了上来,声讨我又犯了错误,申明要以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云云。但是这些“文艺哨兵”如果真的读了我的关于现代性的几篇文章如在《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些文字,就不至于这么“放空”了。

又如,后现代主义主张的“反本质主义”,把事物的本质探讨与本质主义研究,看作是在欧洲统制千年之久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是阻碍文化创新的理论桎梏,而统统被称作“本质主义”加以批判。就我所知,所谓本质主义就是从既定或是给定的先验概念出发,把自己所界定的那个理论尊为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奉为一套宗教信仰,是人人都须遵守的教条。本质主义这种思想确实严重地影响过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但在遭到生存的重大挫折之后,在对文学理论中有关文学本质特性的探讨时,也不时警惕自己,努力不要重犯。不久前,本人在上世纪提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就被当作本质主义加以批判。但是如果批判者读一下我探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文章,就会明白或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一个多层次、多本质的现象,有一级本质、二级本质……文学观念多样性的那些文字,就可能得不出那种信手拈来的结论了!其实,有些本质主义的批判者与他们提供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如极力标榜“碎片化”,“不确定性”,排除深度,主张平面化,“知识化”,看似离开了他们否定的本质主义,可实际上也是一种贯穿了不确定性的、知识化的、平面化的文学本质的表述,或是没有本质的本质主义。所以我以为不能把问题绝对化了。

创新问题一直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建设中的主导思想。有人说后现代主义思想不是一味的解构,也讲建构,有后现代主义的建构,这种说法我是同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破除了原有的一切文化、观念、理论、方法的规则与秩序,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原有的文化积淀。它在触及当代文化现象、文学理论现象方面的视角,确实宏阔多了,新颖多了,贴近现实多了,实用多了,给文学理论以众多的启迪。它来势迅猛,突发性与应对性强,所以界定对象时不免草草从事,而有时缺乏科学性;它论说新颖、种类繁多,各种论说杂然共存于同一平面,因而随机性、不确定性突出;由于否定了大叙事,所以缺乏历史整体性与历史性,而倚重现时性。这种创新能否说是文化横向面上的创新?现代性的建构总是审时度势,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变更自身的理论,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在批判与承认前人研究,获得成绩的基础上有所出新。现代性的创新总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并且有所超越,实现突破;它多半置身于历史语境,承前继后,历史的整体性强烈,这是一种历史纵向发展中的创新,所谓守正创新,理论正道。这是我所理解的两种文化思想的建构与创新。

二

收入这本文集中的有篇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文章，是篇论辩性的东西，在这次论辩中我就写了这篇文章，一些问题还没有回应，只好以后有机会再说。在这里，我想简要地说说一些所谓“辩论”以外的东西。

1982年，我在《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刊于《文学评论》第6期）一文中，提出“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特性的意识形态，评价文艺自然应该进行美学分析，这是过去做得很不够的。但是加强美学分析，并不是否定与美学分析密切相关的历史、社会分析”。我这样提，其实是很不自觉的，那时我虽然参与《文学原理》一书写作，但要写什么，怎么写，还在酝酿之中，文学观念不在我专门考虑的视野之内。但是后来分给我《文学发展论》部分，就使我慢慢留意，要确立什么样的文学观念了，当然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文学观念说法很多，甚至乱说一通也是有的，后来我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看法。1984年，我在《文学评论》发表过三篇文章，其中两篇都提到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创作是审美的反映。但是在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与文学创作是审美的反映两个概念之前，我用的是“有的人认为”，而未用“我们认为”，更未敢使用“我认为”，什么原因呢？一，谁都清楚，过去文学的观念是官方定的，一般学者哪有什么权利对文学下个新的定义？你说“文学是人性”？就批判你，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获得平反。二，1983、1984年间在文化界有个清污运动，清除有关方面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一运动虽然只搞了81天，但知识界心中余悸犹存，所以我这时用了“有的人认为”，一旦追查起来，随时好开脱走人！当时像我这样的所谓知识分子就是这种卑微的心态！1984、1985年间，我的有关文学发展的写作酝酿成熟，将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定为《文学发展论》的两个基本概念，并获得写作小组的同意。于是在1986年发表的《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艺理论研究》第4期）一文中，大力阐释了“审美反映”的概念，而在1987年发表的《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文艺研究》第6期）与1988年发表的《文学形式的发生》（《文艺研究》第4期）两文中，专门探讨了文学观念问题：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以及这一观念形态的历史生成。后来将这些论文连接起来，写进了《文学原理——发展论》一书，1989年出版。提出这些概念，意在批判“左”的

文学思潮与庸俗社会学,让文学回到自身。

1990年,由于“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两个概念,触动了“左”的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碰痛了一些人,于是就被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折腾了一番。有人主编了两大卷《文艺思想论争汇集》,说是论争,其实已经给你定了性。这些人多年以来对马恩有关文艺的论述,注释来注释去,但缺少新意,即使拿出几条新的材料也好,那也是没有的,当然客观上也很困难。可他们唯我独“马”,把审美反映与审美意识形态两个概念,列入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栏目之中,并在杂志上刊文批判:反映论就是反映论,哪有什么审美反映论,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哪有什么审美意识形态?告诫我已经滑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深渊的边缘,回头是岸,否则掉下去就粉身碎骨了!但是过不几天,当有的大领导说了声当前反“左”是主要的,于是大约他们自认为是“左”的,就不做声地偃旗息鼓了。自此以后,我就和他们疏远了,想不到平时还有来往的人,等到形势一有变化,马上就给我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太可怕了。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成立后,我不敢邀请这些人士蒞会指导,尤其不敢邀请有的教授参加学会的文论活动、丛书活动,主要是害怕动不动就把会议上的、交往中的一些不合他意思的说法转给有关部门,让有关部门转到基层组织进行批判。在恶俗的社会气氛中,有的学者在会议上难免会说话走题,出现句把题外的话。不邀请有的教授,主要是想保护自己,并使与会人员有安全感。这样好像安静了十几年,但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这一原本缩了回去的批判,终于找到机会爆发了。批判的主要问题是审美意识形态,同时兼及审美意识、审美反映与新理性精神。批判的组织者曾经向一位赞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说并写入其《文学概论》的教授写信,叫他赶快否定此说,还来得及,否则是会倒霉的。可见批判早有准备,2005年后全面开花。我想,平常我们对某个观点真有什么不同意见,一般写个一两篇文章,也就无话可说了。但是这次仅批判的组织者与批判者一人,从中央刊物到偏远地区师专的学报,都刊有他的批判文章,达十五篇之多(截止2007年)。我们可以进行一下心理分析,一个人要积聚多大的特殊高涨的热情,才会乐此不疲地写出那么多的、大同小异的文章来?发表文章完全是为了宣传与拓展阵地的需要,其团队的批判文章当然更多。同时两校又在北京大学组织大会批判,大喊要阻止、清除“谬种流传”。

2006年上海《学术月刊》主编就传出话来,该杂志不拟再发有关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文章,因为“高层领导有明确指示,审美意识形态不用了”,问

题已经解决。这一“明确指示”很快就成为上海系统某校教授请客会餐时酒酣耳热之际的助兴谈笑资料,所以这个所谓“指示”传到我这里,恐怕已经流传一段时间了。我想我在“文革”十年中遭遇不幸,生死两难,上世纪70年代后期恢复工作后,心想探讨文学理论问题要力避政治话题,但这次就因提了一个小小的文学观念,政治还是找上门来,而且竟是“高层领导”出动,敲上门来了,这怎么不让人联想纷呈!我把这一重要信息报告了童庆炳教授,他向权威部门请示,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指示和看到过这样的文件。2007年,我向上海社科院的那位传达这一“指示”的朋友了解到,原来这是他在北京时一位教授亲自对他说的。至此,这个“高层领导有明确指示”的谜底终于解开!我想,原来还可以用这种办法来影响舆论,左右批判的!

关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争论,表面很是热闹,在一般读者看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批判“文学主体性”以后,好久没有见到过这样大规模的没有运动的运动了,煞是好看,而且都说这是“争论”,这里当然有着争论的成分。但是对于被批判者的我们来说,这场批判后面又分明闪动着刀光剑影,这是善良的读者所看不到的。参与这场争论的还有一些原本就反对意识形态与文学有着紧密关系的老师,这类批判属于正常的质疑与商榷,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论题本身,理论上也确实可以进一步完善与批判的。

回顾六十多年来我国文艺思想的各种批判,清理各种批判的来龙去脉,看看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经过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初,直到这次被批判的各种问题,把它们排列起来,将会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文学理论史课题。

文集最后收有关于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与袁可嘉关于现代派文学研究的论文,虽为纪念文章,但作者都是当作问题来写的,尚可一读。

新世纪以来,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它们的时空不断地在拓展,真是使人奋力追踪也犹恐不及。当我校订完《文学的乡愁》一文时,我立时想到,这个文集里的文章不都是我的乡愁的表达吗,那深深的文学的乡愁!

目 录

自序	001
----	-----

辑一 全球化语境下的理论研究

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	002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	
——文学理论中的现代性诉求与后现代性特征	013
美学:面向原创精神,面向现实与人	030
文化“一体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问题	037
让东方文化重铸辉煌	
——关于东方文化与比较研究的断想	068

辑二 理论研究热点

当前文学理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的终结与消亡、理论的边界与扩容	078
文化与文论	
——文学理论的反思与问题	095

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	121
三十年间	140

辑三 理论研究生长点

文学理论提供知识,也创造思想	
——钱中文先生访谈	158
理解的欣悦	
——论巴赫金的诠释学思想	169

辑四 从作品到理论

历史题材创作,史识与史观	
——文学理论中的现代性诉求与后现代性特征	190
文学的乡愁	
——谈文学与人的精神生态	196
“芳草何其芳”	
——何其芳文艺典型理论的创新意义	208
真正的先锋性	
——袁可嘉先生现代派文学研究的贡献	218

辑一 全球化语境下的理论研究

◎ 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

◎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

——文学理论中的现代性诉求与后现代性特征

◎ 美学：面向原创精神，面向现实与人

◎ 文化“一体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问题

◎ 让东方文化重铸辉煌

——关于东方文化与比较研究的断想

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

20 世纪中外文学理论发展中的 两次错位问题

20 世纪初到 70 年代末，中外（主要指西方）文学理论都面临着确立与充分实现自身的主体性问题。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阶段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与这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相比，在理论倾向上恰恰形成了一个“错位”。所谓错位，主要指双方探讨的问题与兴趣方面，走着正好相反的方向而形成鲜明对照。我们知道，当双方在文学理论问题上认识各异，兴趣各别，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时，是难以进行交流与对话的。

19 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就受到东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中国人需要启蒙，也要救亡。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就是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下，不断寻求自身现代化，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

20 世纪之初，王国维与梁启超开创了 20 世纪我国的两条文学理论路线。王国维在 19 世纪德国美学的思想影响下，突破了中国文学历来所奉行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主张文学回归自身。他认为文学、哲学应与政治分开，过去文学家常以兼做政治家为荣，所以总要使其创作依附于政治，结果使文学“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①。文学描写人生，而人生乃欲望与痛苦，三者互通，无从超越。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引入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文学现象结合起来加以评论，实现中国古代文论最初的现代转化，体现了文学理论的现代精神。这是文学转向自身，力图确立文学理论主体性的一次尝试，并且又充溢着人文精神的关怀。

和王国维几乎同时，梁启超提出了另一种文学主张。戊戌政变（1898 年政治改良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转向文学，认为小说可以移人

① 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见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5 页。